

三湘四水展新颜

■王凤春

在湖南长沙市区，有一处是门非门的地名——小吴门。小吴门原是长沙古城的九门之一，而今已经不见踪迹。现在，作为地名符号的小吴门，指的是长沙市区中山路、八一西路与建湘路的交会地段，它不仅为市民所熟悉，也有一段湖南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有关。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之际，解放军第46军138师在小吴门举行盛大的人城仪式，伴着嘹亮的军歌、迈着雄壮的步伐从这处入城，锣鼓齐鸣、红旗飘扬，10余万市民夹道欢迎。

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造成强有力的军事形势。渡江战役后，解放战争的形势进一步明朗，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解放军控制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及江西、湖北、福建部分地区，进一步为向东南、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条件。为加速战争进程，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作出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其中对第四野战军的部署是：“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个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

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第四野战军主力在5月上旬解放了豫北的安阳、新乡后，于6月上旬，南进至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组织短期休整。正当第四野战军前委决定即将以主力自武汉及其东西地区分三路渡江南进之时，国民党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调集所部守备宜昌、沙市一线的沿江防御，竭力阻止我军过江。为歼灭宋希濂部主力并“尽可能不使该主力退入鄂西及湘西，威胁宜、沙、常、澧”，第四野战军前委决定立即发起宜沙战役，歼敌主力后再乘胜南进。宜沙战役历时28天，先后解放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17个县市，切断了白、宋两部的联系，打开了进军南进湘西的大门。在宜沙战役进行的同时，针对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利用湘赣山区及九岭、汨罗江等有利地形阻止我军沿粤汉路南下的企图，第四野战军果断发起湘赣



1949年8月，解放军进入长沙。

战役，此战历时12天，解放了赣西及湘东22个县城，为随后解放中南全境，打下胜利的基础。

宜沙、湘赣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第12、第13兵团和归第四野战军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分别从常德、浏阳、萍乡、永新逼近长沙，形成对长沙的钳形包围之势，长沙解放指日可待。

政治争取工作打开缺口促成乐观的和平形势。长沙实现和平解放，除军事形势推动外，政治争取工作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为政治争取目标，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程潜上任主政湖南开始，中共湖南省工委就密切关注他的政治动向。鉴于程潜与我在重庆谈判期间有过良好合作，其许多政治主张与蒋、桂系均相悖，并有意靠拢人民，湖南省工委成立专门工作组对其展开统战工作。毛泽东同志对湖南和平解放十分关注，多次指示湖南省工委着重做好程潜和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等人的工作，并委托民主人士转达殷切期望，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进一步鼓励和坚定了程、陈起义的决心。华中局和第四野战军领导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与湖南省工委共同商办统战工作的具体办法，多次派员与程潜代表联络军事起义和和平接管的相应问题。与敌军工作同步展开的群众工作

也卓有成效。从1949年初起，湖南人民呼吁和平的声浪此起彼伏，热爱和平、期盼安宁的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先后成立“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等组织，旨在利用各界力量影响和争取湖南脱离国民党黑暗统治、走和平解放的道路。长沙市的市民和学生也自发组织集会游行，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在军事、政治、社会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程潜、陈明仁决定顺势而为、顺应民意，接受和平主张，于8月4日在长沙正式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以人民军队为伍”。义旗高举乃民心所向，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爱国行动给予嘉勉，并指出争取他们弃暗投明站到人民一边，对于分化残余国民党力量具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和平解放乃民心所盼，湖南各界迅速予以响应，饱尝战乱之苦的湖南人民从此走出苦海。

团结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平稳重塑湖南新政权。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

发展的力量源泉。湖南和平解放后，为迅速稳定军政形势，实现平稳建政，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就如何建立湖南新的军政机构以及整编起义部队作了原则性指示，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方式方法，并强调对起义部队政治上予以信任、待遇上一视同仁。

在组建湖南新政权的过程中，党中央充分尊重和肯定程潜、陈明仁等人提出的意见，并予以反复磋商，充分吸纳爱国义士在新的军政机构中担任要职。8月19日，长沙市军管会成立，萧劲光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任副主任。29日，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扩大改组为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30日，湖南军区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陈明仁、韩先楚任副司令员。9月1日，湖南临时政府成立，陈明仁任主席。

在整编起义部队的过程中，第四野战军和湖南军区派出工作组，调派531名政治工作干部到起义部队，以思想改造为中心，以改造促整编，广泛深入开展形势教育、政策教育、人民军队本质教育和传统教育，同时开展民主运动、爱国运动和生产运动，使起义部队从思想上、作风上实现根本转变。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前委于10月20日下达整编命令，将陈明仁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辖第52、第53军，任命陈明仁为司令员。12月2日，起义部队在驻地浏阳县城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会上，中央军委向部队授予“八一”军旗和印章。起义部队受到极大鼓舞。

麓山湘水展新颜，中南大地谱新篇。湖南和平解放是军事、政治、统战工作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解放战争决战决胜阶段的一次重要胜利，是我党取得全国范围胜利的基本形势下，继北平之后全国第一个省级政权的和平更替。湖南和平解放不仅宣告国民党残余反动集团崩溃之日正加速到来，也预示中国解放事业的全面胜利正加速到来。



读兵书 研战策

原典

居常虑变，处易备卒。屯营者，务持重。

《投笔肤谈·达权》篇中提出，在作战中，正常情况下要考虑可能的事变；在顺利环境下，要防备突然事故。军队扎营务必谨慎稳定，须谋定而后动，切不可轻举妄动。正所谓“持重者，不轻动也，如亚夫之夜惊寝”。

经典战例

汉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袭扰内地，企图攻城略地。匈奴也联合羌人共同侵略汉朝疆土，汉武帝曾出兵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便是阻止这种联合，但派出的军队被羌人所败，损失惨重。

到了汉宣帝时期，面对日益严重的羌患，朝廷不得不启用老将赵充国。出发前，汉宣帝曾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豫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表示用兵不能光靠空想，必须前往一线观察情况，谨慎思索后作出应对之策。

神爵元年四月，赵充国率骑兵万余人进行西征。兵抵金城后为防止羌兵在汉军渡河时突然出击，他先派出3个小分队趁夜渡河，在对岸建立阵地，以掩护第二天全军过河。过河后即安营扎寨严阵以待，面对羌人不断侵扰挑衅，赵充国坚守不出，始终没有追击西羌主力，而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向敌深处推进，直插西部都尉府。进驻西部都尉府后，赵充国仍按兵不动，此举也引发汉朝朝堂争议，认为赵充国年老怯懦、消极避战。

赵充国并未因朝堂上的质疑而轻举妄动，而是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汉朝的军队封锁了西羌和匈奴之间的联系，同时挡住匈奴的进攻，西羌失去匈奴的外援，只能独自和汉军交战。另一方面，赵充国同时派人去西羌各部落送信，高价悬赏造反的西羌首领和士兵的人头，杀死别的部落首领的还能得到被杀者的全部财产，能够迷途知返的算作无罪。在策略生效之前，赵充国继续等待时机，偶尔派出精锐骑兵，对敌方主力进行小规模歼灭战，同时派出步兵在当地进行屯田。几个月后，西羌部落内部开始瓦解。七月，赵充国率军推进至先零地区，重创羌军。十二月，西羌各部彻底陷入混乱，赵充国奏请撤除骑兵，以步兵屯田戍卫，已遭重创的羌军或死或降，汉军大获全胜。

战例解析

居常虑变，处易备卒，这是成熟的统帅将应当具有的心理状态和战斗习惯。而定了“屯营”求胜的决心之后，如何真正让部队扎下根来，稳定下来，生存下来，是实现以静制动、扭转局势的先决条件。

出兵之前必须有细致而周密的谋划。作战有扎营和列阵，有野战和守备，有进攻和防御，有敌方和我方。善于用兵的人必须考察虚实形势，比较敌我情况，研究先后的关节，须先有“谋”而后有“动”。将敌我兵力、战场情况、后勤补给、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都考虑到，方能作出兵力部署，决定下一步军队应当如何行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纸上谈兵必会招致失败，科学灵活的决策方案必须基于对敌我情况的充分研判和对战场情况的实地考察。辽沈战役期间，为全歼锦州守敌，我军在塔山一线构筑了防御阵地，阻击由葫芦岛方向北上援锦的敌军。从地图上，葫芦岛、塔山、锦州由西南到东北连成一线，是辽西走廊的重要通道，确有从中间将其切断的必要性。然而，若去实地勘察就会发现，

屯营者，务持重

■李梦蝶 闻彩

——汉将赵充国平西羌之战

虽名为塔山，却无塔也无山，不过有一个稍稍隆起的土包而已，若要在此地固守，必须构筑完备的工事体系，并组织强有力的预备队，方可实现目标。正因为如此，东北野战军在塔山方向布置了一支善于防守的部队，并预留出充足的预备队，这是塔山阻击战能够取胜的重要基础。

择地驻扎和行军都需慎察敌情。部署和安置军队都要研判地形和敌情，只要不轻敌冒进，并能做到集中兵力、研明敌情、取得部众的信任，就是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取得战争胜利。因地制宜、因敌而动，熟悉掌握作战区域的地形和敌情，是求取胜利的先决条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对地形和敌情的掌握不啻多么细致、多么具体都不为过。1954年底，张爱萍指挥华东军区部队，进行攻击一江山岛的各項准备工作。在战前侦察的过程中，张发现，由空军侦察机传回来的照片中，大部分图像较为清晰，唯独有一块不大不小的模糊区域。他为此专门询问了空军作战部门的同志，得到的答复是这里有可能是敌人的高炮阵地，飞行员为规避敌军的防空炮火，对这片区域进行屯田。几个月后，西羌部落内部开始瓦解。七月，赵充国率军推进至先零地区，重创羌军。十二月，西羌各部彻底陷入混乱，赵充国奏请撤除骑兵，以步兵屯田戍卫，已遭重创的羌军或死或降，汉军大获全胜。

力求以最小代价取得战争胜利。用兵打仗的上策是在未战之前就用计谋挫败敌人，其次才是使用军事力量威慑敌人使其屈服，再次是通过野战打败敌人，下策才是攻打敌人的城池。因为攻城略地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往往伤亡惨重且耗费时间，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往往是古今名将所追求的。赵充国在平定西羌的过程中，着眼长远，稳扎稳打，始终以较小代价博取较高回报，这对于日渐衰微的汉朝来说，无异于一种非常讲求效益的作战方法。在战场上，最让指挥员懊恼的，就是有绝佳的歼敌战机，手中却无兵可用。究其原因，就是在前期的备战建设或战斗过程中，没有量入为出，做不到宽备窄用，结果真到了关键时刻手中无兵、营中无粮。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力量薄弱，如果一味地和日军拼消耗，打堂堂之阵，势必难以坚持。在持久战方针的指导下，各地区人民军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因地制宜开展敌后游击战，或炸掉一个碉堡、或歼灭敌一个小队，久久为功、积少成多，最终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实现了整体作战实力的强弱逆转。

将士持矛槊，铁枪卫城郭

——各有千秋的中国古代长兵器之二

■曹波



战国晚期虎头纹青铜矛。



秦汉时期铁质槊锋。

长兵器是古代较长的手持格斗兵器的统称，相对于短兵器，其具备在更安全的距离抢占先机、击杀敌人的优势。为适应不同的战场需求，古人打造了种类众多的长兵器，有的以直刺为攻击方式，有的以横向钩砍为攻击方式，还有的兼具多种攻击方式。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中国古代兵器谱里的戈、戟、钩镰枪和狼筈。本期，我们介绍矛以及以矛为基础演化而来的槊和枪，去感受中国古代长兵器的魅力。

矛是一种用于直刺和挑扎的长兵器，是中国古代军队大量装备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冷兵器之一，出土的实物表明矛早在商朝时期就已大量装备军队。矛主要由矛头和矛柄组成。矛头分为身和骹两部分。矛身顶端为锋，中部为脊，脊左右两边展开为带刃的矛叶，散呈筒状，用于插柄。矛柄也称为柂，一般为木质或竹质，末端装有铜、铁等金属制成的缚，便于矛平稳立置。商朝时期的矛为青铜阔叶矛，装备数量仅次于戈。西周时期，阔叶矛逐渐演化为窄叶矛，至春秋晚期出现了形制成熟的体窄、刃直、骹部有孔或双钮的窄体矛。战国中晚期，出现了脊线两边有凸起而形成血槽的矛，这种矛在刺入人体时出血进气，杀伤力更强。西周至春秋时期，矛的种类有步卒使用的首矛和车兵使用的夷矛。据《周礼·考工记》记载，首矛柄长二丈，便于步卒在两军相接时平刺；夷矛柄长二丈四尺，约相当于人体的3倍，往往在战车上放1到2支备用。矛柄的长短是由实际作战的不同需求决定的，战车使用的矛如果短了，就刺不到敌方战车上的首矛，因此战车用的夷矛比步卒用的夷矛更长。秦朝时，秦朝的铁质矛趋向而直，制作也越来越精良，但始终不能取

代戈的位置。

汉朝时期，骑兵逐渐兴盛，由此出现了由骑兵作战的长矛演化而来的槊（又称稍），从此开启骑战角斗的时代。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随着重装骑兵的出现，迎来了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人马都身披两档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槊由槊锋和槊杆组成，槊锋多为菱形，与矛头相比更长、更重、更锋利，其长度为50至60厘米，可以轻松击穿敌人的铠甲。槊锋装上槊杆后，整体长度可达4米左右，能够承受马高速飞奔时的冲击力，对提高重装骑兵作战具有重要意义。隋唐五代时期，槊仍然是重要的兵器。火器出现以后，槊也随着重装骑兵退出了战场。

被誉为“百兵之王”的枪，是由矛演变而来的。枪由枪头、枪缨、枪杆3部分组成。枪与矛的区别在于枪头比矛头的刃部短而尖锐，所以刺杀时枪比矛更为轻便锋利。枪杆为木质或竹，枪缨长度在20厘米左右，多用绒绳或兽毛制成，多为红色，有刺杀时防溅血之用，也可防止血顺杆而下造成握枪打滑。在汉朝以前的典籍中，就已多次出现“枪”这个字。到晋朝，枪逐渐流行起来，被广泛应用于作战。唐朝时期，枪的用途甚多，比如两军交战时，士兵直接用枪刺杀敌军；安营扎寨时，立起枪可筑营墙；涉渡河川时，也常捆枪为筏。宋朝时期是枪的黄金时代，宋军作战以枪为主，枪的形制和种类也获得了极大发展。《武经总要》中记载了宋代枪的常见形制，称为“枪九



清朝钱空铜绣球花枪。

色”。此外，这一时期出现了枪与火药筒结合的“梨花枪”，因药筒中喷出之药像梨花飘落而得名。它在原有枪的红缨部位绑上一个喷火筒，交战时先用火药烧灼敌人，药尽再以枪头刺杀。杨门女将穆桂英使用的正是此枪，枪法如雨散梨花，曾大破辽军天门阵，威震四方。此外，杨家将以善用长枪而闻名，并创设了一套名为“杨家枪”的枪法。比如，杨六郎杨延昭借芦叶枪镇守三关，抵御契丹。明清时期，虽然火器获得了发展，但枪仍然是近战的主要兵器之一。

矛及由它演化而来的槊、枪等兵器，不仅丰富了中华冷兵器库，更体现了古人极高的智慧和极强的创造精神。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的赵充国陵园。